

论北宋政治变革时期的文化

李 华 瑞

(一)

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是北宋中期两次大的变革运动,虽然这两次改革运动中间相距差不多24年的时间,但是一般认为熙丰变法是庆历新政在更大规模和范围上的继续。这是因为:一、庆历新政拉开了宋代变法运动的序幕,由于庆历新政的昙花一现,未能缓解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因而随着统治阶级的危机的加深,士大夫要求改革现状的呼声不断高涨,“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①二、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改革的新举措和新动向,如陕西青苗钱,郭谠千步方田法,浙江路李复圭改用出钱召人承募衙前役等^②。从而为大规模的变法运动作了准备。由这二点来看,把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约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过程,称作变革时期,大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以往在评价这两次变革运动,特别是对持续了十六七年的熙丰变法的社会效果时,多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角度着眼,而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即变革时期的文化。因而以往的评价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文化不仅是这一时期历史活动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是承先启后的两宋文化中的最高峰,这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标识:

1. 被冯友兰先生称为中国哲学中的最大派别的道学或称理学，发轫于庆历前后的儒学复兴运动，形成并有初步发展于熙丰之际。朱熹所写理学六先生像赞的周惇颐（1017—1073年）、张载（1011—1077年）、司马光（1018—1086）、邵雍（1011—1077年）、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的学术活动都在这一时期，理学的重要著作如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易通》，张载的《正蒙》、《经学理窟》，邵雍的《皇极经世书》都完成于这个时期，重要的理学范畴、命题都已经提出^③。

2. 这一时期的散文（即古文）创作达到了宋代的最高峰，《宋史·文苑传》说“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文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为昌，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明初朱右曾以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与唐韩愈、柳宗元共八家之文编为《八先生文集》，后茅坤据唐顺之《文编》于唐宋两代散文亦独取此八家之例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44卷，盛传于世，八家之名遂为不易之论。宋文六大家的创作，除苏辙而外，主要集中在变革时期。

3. 受古文运动的强大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亦进入了全盛期。前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后有王安石、苏轼，宋诗的艺术特征，诸如议论化、散文化和平淡自然的风格，在他们的诗中形成并臻于成熟，“庆历以后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王（安石）数公出而宋诗一变”^④，“卓然与唐诗并峙比美”^⑤。

4. 宋词在文学史上与汉赋、唐诗、元曲并称，是所谓“一代之文学”。历代评词者多认为词至北宋而大，“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⑥，而宋词其所以能蔚蔚大国，又恰恰是在北宋的变革时期。先是范仲淹、王安石所填词一洗五代旧习，成为苏轼开创豪放派的先驱和同调，而词至苏轼“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⑦，他在柳永慢词长调的基础上从根本上创造了词的体

制，提高了词的地位，开创了词的思想内容，并在风格上冲破婉约派的一统天下开旷达与豪放之风，给词注入新的生命。

5. 山水画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瑰宝，有人甚至认为“它与相隔数千年的青铜礼器交相辉映，同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罕见的美的珍宝。”^⑧从绘画史的发展来说，山水画历五代至宋初李成、关仝、范宽、“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已远远超迈晋唐^⑨，而至熙丰之际，北宋重要山水画家郭熙在李成的基础上“有崭新的创造和提高，把北方山水画派推向新的水平，成为北宋一代山水画巨匠”。他的作品以及充分展现他的艺术见解的山水画专著《林泉高致》都体现了那一时期山水画艺术的高峰，即得以居高临下地一览晋唐至五代宋初山水画的全貌，从创作和理论两方面，对山水画艺术进行了总结。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郭熙进入神宗时期的画院，受到神宗的赏识，从而使山水画由民间走上皇家的艺术殿堂，终于取代了宗教画的主导地位。^⑩

6. 两宋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鼎盛期，而足以使宋代史学凌驾于汉唐、睥睨明清的成就，主要地也是在北宋变革时期确立起来的。欧阳修重撰的《新唐书》（本纪、志、表）、《新五代史》和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代表了两宋史学的最高成就。而史学领域扩及金石学则是宋代史学发展的又一突出成就。从庆历五年至嘉祐七年欧阳修编成《集古录》一千卷，并撰《集古录跋尾》十卷，是为我国金石考证之学的开山。以石文校史事，大大提高了鉴别审订材料的水平，表明宋人在史料学方面的进步，近人傅斯年在史学方法专论中曾例举欧阳修的著作后，说道：“北宋人的史料分析工夫到这个地步，所以才能有唐书、通鉴那样的制作。”^⑪金石考异方法的创立，遥开近世乾嘉之学的先河。

7. 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

科学方面都是如此，”^⑫于此可见宋代科技之发达，但足以代表宋代科技最高水平的科学家和科学著作，是积极参与了熙丰变法活动的沈括和他写的《梦溪笔谈》。沈括博学多能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说“我国文学家之以科学著称者，在汉有张衡，在宋则有沈括。《四库全书总目》谓括在北宋，学问最为博洽，于当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钟律，尤所究心，《宋史》载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洵非溢美，自来我国学子之能谈科学者，稀如凤毛麟角，而在当时能以近世之科学精神治科学者，则更少。”^⑬钱宝琮先生认为：“《梦溪笔谈》虽非天算专著，而卷十八所载隙积术及会圆术实开后世垛积术及弧矢割圆术之先河，他卷中有谈及天文历法地理物理者，亦无不精妙绝伦，淹通如沈括，洵中国科学史上不祧之祖也。”^⑭李约瑟博士认为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美国席文博士亦有与此相类的看法。^⑮

8. 北宋变革时期是一个产生文化巨人的时代。翻开历史长卷，每朝每代都有各自引以自豪的文化巨人。但是像这一时期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沈括、苏轼等人在诸如政治、文学、史学、经学、科技、艺术等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足以彪炳史册，领一代风骚的文化巨人则是不多见的。北宋变革时期还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本师漆侠先生在论范仲淹政治集团时曾指出：“由范仲淹、杜衍、欧阳修、石介、余靖、蔡襄、尹洙、韩琦、富弼、孙沔、滕宗谅、王益柔等人构成的政治集团，以及在思想上理论上支持范仲淹改革的胡瑗、孙复、李觏，他们在思想上表现了生动活泼的创造性，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做出了惊人的贡献。在范仲淹集团中既有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有思想家、教育家，既有诗人、词人、文学家，又有艺术家，在整个封建时代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凝集了这样多的人才，作出这样绚丽多彩的贡献。”^⑯

以上事实说明北宋变革时期的文化，不仅是宋代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而且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里亦占有重要地位。固然，文化发展的高峰不是一蹴而就，它有一个不断积累、演进的过程以及相应的社会历史渊源，但是文化发展的高峰出现在两次变革时期，这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下面就这个问题试作探讨。

（二）

考察北宋变革时期的文化，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政治革新浪潮涌动的同时，文化领域几乎也是全方位地出现了革新的局面。

在艺术领域，十一世纪之初，在世的著名画家所余无几，范宽、燕文贵、武宗元的死，和郭熙、苏轼、王诜、李公麟、米芾、李唐的出生，都是发生在仁宗一朝的事，这就使宋仁宗时代成为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到王安石和司马光接替欧阳修、范仲淹登上庙堂时，这一批新起的画家也陆续出现在画坛，初试身手了。在他们之前的画家们，已经把中国绘画推向登峰造极的境地，“岭头便是分头处”；再往前进，发展即是变革。郭熙、苏轼、李公麟、米芾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各自的领域，为这一转变作出了贡献，使这个时代成为中国绘画发展的又一分水岭。

在文学领域，《神宗旧史·欧阳修传》总结北宋诗文革新的发展云：“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以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欧阳）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箧中得本学之，后独能摆弃时俗，故独步与司马迁、贾谊、扬雄、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侵寻乎其相及矣。是时尹洙与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材下，人莫之与。至修

文一出，天下之士皆响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字，大变从古，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①⑦}。“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①⑧}

对这场古文革新运动，程千帆先生指出“北宋中叶的文学革新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欧阳修领导并完成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或新古文运动，确立了散文的正宗地位，使骈体文在六朝以来六百年间所占的优势从此告终，由于古文运动的强大影响，产生了宋四六和文赋，宋诗也开始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卓然与唐诗并峙比美。”^{①⑨}

在经学或哲学思想方面，宋儒以义理之学对汉唐章句之学的革新始自宋仁宗庆历前后的疑古思潮。朱熹说“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字）、原父（刘敞字）、孙明复诸人，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覲）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②⑩}

“唐初诸儒作为疏，因为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指毛、郑）之区域。至于本朝刘侍读（敞）、欧阳公（修）、王丞相（安石）、苏轼、黄（庭坚）与河南程氏，横渠张氏（载）始于己意，有所发明。”^{②⑪}

陆游亦曾概括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正》、《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②⑫}

这种讥黜经传的学风，实不免有臆断之弊，但从“疏不破注”，到“舍传求经”，再到“疑经改经”，确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这一运动，造成了两汉以来中国学术史中罕见的活跃气氛，开创了中国哲学最大的学派。总之，这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时代，王安石之学被后世称作“新学”、他主持编定的《三经义》，被叫做《三经新义》。与王安石之学鼎立的关学、洛学也是反对守旧而求新意，张载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②“义理有疑，则濯之旧见以来新意”^③。程颐则说“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也，未有不进而不退者”^④，程颐这句论学的名言可作为整个变革时期学风的写照。

就上述文化革新与政治革新的关系而言，值得注意的是文化革新成为政治革新的先声，也就是说文化革新不仅反映了变革时期的时代精神，也在舆论上和理论上为改革变法活动做了准备。众所周知，孔子儒学的政治思想以“内圣外王”之道为最高理想，所谓内圣是指个人修养，人人都可以通过个人修养而成为道德上的圣人贤者；所谓“外王”即是经世，人人都可以通过这样的努力而实现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理想。故自儒学诞生以来实现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儒生们共同奋斗的目标。到了宋代儒学复兴之际，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宋儒们通过成德立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就更具有时代特征，他们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经世济用之学。

早在儒学复兴运动初起之时，士大夫们就不是单纯地从理论上探索经学，而是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所实施的“湖州学法”；就极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学以致用的特征。“安定先生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修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⑤二程对张载关学学风的赞誉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儒学复兴时期重实践的学风，“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

几善学者。”^②再从儒学复兴时期，儒学经典中的《易经》《春秋》《周礼》受到特别重视成为显学来看，亦是适应变革政治的需要，宋儒借《易》发挥哲理，以论证现实的社会秩序；借《春秋》倡导尊王，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借《周礼》以申述改革积弊的政见，因而经学逐渐从哲学和政治学说两个方面求得新的发展。

至于发动和领导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的范仲淹、王安石更是摆脱前此旧注疏，径直从经典中寻找变革的根据。范仲淹早年从戚同文学，相传博通六经，尤精于《易》，在现今保留下来的《易义》中，范仲淹对易经中随时变易思想的阐发，正是为其社会变革提供理论根据，在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奏议中，范仲淹指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而“救乱”就需要变革，因而他引《易经》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教导来进行政治改革，从而充分体现了通经致用的实践意义，范仲淹实际上在把宋学与政治变革结合中起到了带头人的重要作用。^③

王安石未执政前，潜心究读儒家经典“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④又博取诸家思想之长“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⑤至嘉祐治平年间一方面撰著《淮南杂说》《洪范传》等畅谈道德性命之理的理论著作，一方面则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提出了一整套纲领性的变革政治的方案。可见王安石通经致变的目的十分明确。另据南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所载，王安石对易经颇有研究，其中曾引了一段王安石所作《易·井之九三》的注文解释，“求王明，孔子所谓异乎人之求也。君子之于君也，以不求求之；其于民也，以不取取之；其于天也，以不祷祷之；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无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⑥对这段注文解释，王应麟大加赞赏，认为颇绝妙，而清代学者全祖望则把这段注文解释与王安石执政前后的政

治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评论说“荆公学术略于此，所谓不求求之者，即其初年屡征不赴之术也；以不取取之者即其不加赋而国用足之说也，以不祷祷之者，一变而遂为天变不足畏之妄谈也。”^②于此亦可略见王安石通经致变之一斑。

要之，从范仲淹到王安石一再把经世济用的经学放在社会实践上，实际上这也就是把儒生们所尊奉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最高理想不是托诸空言，而是通过社会实践付诸实现。是故，当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高擎文化革新大旗之时，已为他们的政治革新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政治革新与文化革新不完全同步。这有二个层面的含义。1. 在文化革新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文艺观和不同学术派别是导致政治上对立的重要原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革新的进程，如苏轼和二程有关文与道关系的分歧，是日后蜀党与洛党之争的重要原因；又如在义利之辨上的不同，是二程理学派反对以理财为重心的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根源。2. 无论是变法派还是不赞成变法的对立派尽管政治见解不同甚至对立，但在文化领域许多方面的追求革新和进步则殊途同归。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譬如古文革新，在前期欧阳修既是发起者又是文坛盟主，其后则是王安石、苏轼相继主盟文坛，他们直承欧阳修的文风，并有所创新，从而使古文革新赢得彻底的胜利，无疑他们都是古文革新的主将或实践者，都取得了很高的创作成就，但在政治上苏轼是王安石的对立派，即是欧阳修也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曾上章反对青苗法。又如在词风变革上，王安石与苏轼也是同调。在经学革新上，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氏蜀学派、二程洛学派等各派之间尽管因政见、学术观点、艺术主张不同，在政治上甚至是对立的，但他们在以义理之学代替章句之学的经学革新根本点上则是一致的。唯其在革新的根本点上一致，而又呈现出各自的特色，相互争鸣，学术思想较为自由，才使得文化革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反

观政治革新，由于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缺乏根本的共同点，最终以历史的挽歌划上了句号。

(三)

毋庸置疑，政治革新对文化的大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两次改革运动期间兴办学校、重视人才的文化政策上。范仲淹、王安石都十分重视学校对培养人才的作用，北宋三次兴学高潮有二次发生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期间。元代李祁曾对范仲淹兴办教育，推进儒学复兴的贡献评述说“当是时天下郡县未尝皆置学也，而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孙氏于贫窶中，使得以究其业，延安定胡公入太学，为学者师。卒之泰山以经术大鸣于时，安定之门，人才辈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赏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后横渠张子，以盛气自负，公复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关陕之教，与伊洛相表里。盖自六经晦蚀、圣人之道不传，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后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劝奖，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名教。夫岂少哉”。^③

其次是改革者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以行政权力推进文化革新。嘉祐二年的科举改革是北宋古文革新运动获得全胜的一大关键。这一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他用行政手段推行了革新的主张，“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文涉雕刻者皆黜，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器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④。是科，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进士及第，得人之盛，号称一时。又如王安石执政时“荆公新学”在行政权力的支持下得到极大的发展。由于三经新义和易解“行于场屋”^⑤和作为学校教材，因而荆公新学成为流行六十余载的官学，从而确定“义理之学”的法

律地位。这一点对于自庆历前后以来的疑古思潮得到官方承认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它标志着宋义理之学代替汉唐章句之学的完成，熙宁六年三月，宋神宗说“今岁南省所取多知名举人，士皆趋义理之学，极为美事”^⑧。

第三、文化创作的高潮是伴随着政治斗争的高潮而出现的。自庆历前后儒学复兴运动兴起后，在嘉祐治平年间，苏氏蜀学、荆公学派、二程洛学派、张载关学派已初步形成，但在熙丰之际获得大发展的是荆公新学的二程洛学。荆公新学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在官府支持下，其学术风行六十年自不待多言。而代表豪族利益的洛学在当时虽处于民间，但它得到了反变法派的核心人物的支持。我们知道，程颢自青苗法推行以后，从变法派阵营中脱离出来，站到了旧党一边。其后程颢被贬回到洛阳与其弟程颐一起讲学传布自己的学术主张，当时旧党的著名人物司马光、文彦博、富弼、吕公著等人也大都退居洛阳，程颢与他们过从甚密，相互标榜形成了在野的政治舆论力量。对此，王夫之在论“洛学”和“关学”盛衰时曾指出“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张子教学于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巨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未由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与颢颙，而世之信从者寡，故道之诚然者不著，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⑨在王夫之看来，关学其所以不能如洛学被发扬光大，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张载在当时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斗争中“素位隐居”，而未得到“巨公耆儒”的反变法派核心人物的支持，即“相为羽翼”所致，此言虽不免失之偏颇，但亦可从一个侧面说明理学的发展与当时政治斗争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有宋一代散文的成就以北宋变革时期六大家散文为最高。这一时期的散文若从思想内容来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证为目的的政论之文，

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其中尤以政论之文最具特色。欧阳修的古文写作和理论，是为当时的政治改革服务的，他认为作家不能回避社会矛盾，粉饰太平，而必须揭发弊端，以利改革，景祐年间，他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指出“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辨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盖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③⑧}欧阳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象著名的《朋党论》《与高司谏书》《准诏言事上疏》《本论》《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等代表作即是庆历新政前后的战斗檄文。王安石作于变法活动时期的政论文《上仁宗皇帝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乞制置三司条例》等也都是其重要的代表作。它们体现了王安石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更多地强调文学经世致用的实际价值思想，亦即他在《怀祖择之书》中所说的“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③⑨}苏轼自嘉祐以后大半生卷入变法斗争的旋涡中，因其政治立场多变，不为新旧党所容，于是“一肚皮不入时宜”^{④①}的思想都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思想论》《六国论》^{④②}《续朋党论》《留侯论》《教战守策》《日喻》等。不言而喻，经世致用思潮是促成宋代诗文书画革新运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它首先通过这一时期的古文创作和古文理论表现出来。而这一时期的政治革新就是经世致用思潮最充分的实践。因而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政论文也就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第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于庆历新政失败后在邓州所作的“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它既是政治改革家范仲淹忧国忧民情怀的真实写照，同时它又集中展现了变革时代有志于天下的知识分子的坦荡的襟怀和强烈的责任感。正是怀抱着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文学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关心民

众疾苦，反映社会现实的不朽作品。如梅尧臣的《田家语》《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庆州败》、欧阳修的《食糟民》《边户》、王安石的《感事》《兼并》《省兵》《河北民》等就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来描写人民的疾苦、国势的积弱、内政的腐败，毋庸置疑，由政治变革带动的诗文风格革新固然不是文学发展的唯一动力，但它促使文学内容适应时代精神不断更新，则是文学保持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关键。

注：

- ①《陈亮集》（增订本）卷十二，《铨选资格》。
- ②参见漆侠《王安石变法》第61～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 ③《宋明理学史》上卷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 ④全祖望《宋诗纪事·序》。
- ⑤程千帆等《两宋文学史》第3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 ⑥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十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⑦刘辰翁《须溪集》卷六《辛稼轩词序》。
- ⑧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 ⑨《图画见闻志》卷一《论古今优劣》。
- ⑩《中国美术史》第四卷，《五代两宋时期的美术》第52～5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 ⑪《傅斯年全集》第2册，第364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 ⑫《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一卷，第287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 ⑬《竺可桢文集》第69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 ⑭《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第304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 ⑮参见《沈括研究》第64～6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⑯《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载《历史研究》1992年3期。
- ⑰《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第三，四库丛刊本。
- ⑱《苏东坡全集》卷三十四《六一居士集叙》。
- ⑲《两宋文学史》第3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 ⑳《朱子语类》卷八。
- ㉑朱熹《吕氏家塾读诗记序》，四库文渊阁本。
- ㉒《困学记闻》卷八《经说》。
- ㉓《经学理窟·义理》，见《张载集》第274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 ㉔《经学理窟·学大原下》，见《张载集》第286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 ㉕《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二程集》第325页。
- ㉖《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之二《安定先生》。
- ㉗《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学篇》。
- ㉘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载《文史哲》1995年1期。
- ㉙《郡斋读书志》卷四下。
- ㉚《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答曾子固书》。
- ㉛《困学纪闻》卷一。
- ㉜《翁注困学纪闻》卷一《易·井之九三条》
- ㉝《范文正公集》褒贤祠记卷二，文正书院记。
- ㉞《长编》卷一百八十五，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
- ㉟《郡斋读书志》卷一上。
- ㊱《长编》卷二四三，熙宁六年三月庚戌。
- ㊲《张子正蒙注序论》见《张载集》第409页。
- ㊳《欧阳文忠公集》卷六十七。
- ㊴《王文公文集》卷五。
- ㊵《梁溪漫志》卷四。
- ㊶《六国论》见诸《东坡志林》中的“论古十三”文章标题各本有所不同，明万历年间赵开美刻本作《游士失职之祸》，《东坡七集·续集》作《论养士》，而《三苏文粹》作《战国任侠》，郎晦之（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作《六国论》，今从后者。

作者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耿素丽）